

v	序言
1	第一章 緒論
17	第二章 舉止：理論與歷史
17	壹、舉止與情感機制的演變
22	貳、舉止與良善社會的形塑功能
32	參、舉止與情緒調整的歷史
49	肆、正式化與意識形成的長期過程：第二天性
57	第三章 社會混合與地位焦慮
58	壹、社會混合、地位焦慮、以及面對面階級衝突中的暴力
63	貳、地位焦慮與迴避行為
69	參、對於社會與心理污染的恐懼
77	肆、從優先適用到一體適用的規則
80	伍、地位焦慮：攀升的恐懼與下降的恐懼
84	陸、迴避行為的國際化：避開帶有優越感的措辭
91	第四章 社會與心理距離的縮減——社會整合與認同的遞增
91	壹、階級區別、國家整合與非正式化上的一般趨勢與各國差異
105	貳、浪漫化：做為「屬於我們自己的高貴野蠻人」之下層階級
107	參、以主張隱私權做為保持距離的方式

115	肆、降低對熟稔的厭惡：增加社會與心理接近
142	伍、語言的使用
152	陸、擺脫束縛，放鬆自在、真實與自然的限制
157	柒、國家整合與相互認同之層次的比較
169	第五章 介紹與友誼、稱呼的方式及國家習癖形成的其他差異
169	壹、國家發展的一般概況
175	貳、德國與美國習癖的比較：公與私
178	參、德國稱呼的方式：稱謂以及職業頭銜
181	肆、在德國與在英國中的友誼
194	伍、非正式的代名詞：Duzen
200	陸、在德國中的介紹
202	柒、正式-非正式的跨距：做為德國「社會逃避」的裸體主義和露營
206	捌、在英國中的介紹
212	玖、打招呼或是不打招呼：認可的權利就是「喊卡」的權利
216	壹拾、英國的習癖
224	壹拾壹、關於皇室及社交旺季的種種
226	壹拾貳、正式-非正式的跨距：鬧場、海水浴場、遊艇
230	壹拾參、在荷蘭中的介紹
233	壹拾肆、荷蘭的習癖
245	壹拾伍、美國的階級與良善社會
251	壹拾陸、兼具階級與國籍功能之美國人的地位不安全感
254	壹拾柒、美式介紹、碰釘子，以及稱呼讀者的方式
261	壹拾捌、美國的習癖
273	壹拾玖、結語
275	第六章 螺旋狀的非正式化過程：非正式化與再正式化的階段
276	壹、(十九)世紀末
278	貳、咆哮的一九二〇年代
283	參、從一九三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

285	肆、週期化的課題：兩次世界大戰
287	伍、情感革命
291	陸、一九八〇年代以及一九九〇年代：再正式化
299	柒、非正式的螺旋狀過程
303	捌、非正式化與社會整合的螺旋狀過程：兩個階段
308	玖、螺旋狀過程中的社會與心靈變
316	拾、我們與我之平衡的螺旋狀運動：個人化
325	第七章 連結社會與心理的過程：第三天性
325	壹、演變的三個體制
331	貳、連結社會與心理的過程
357	參、邁向對優越感與自卑感之經過控制的去控制化？
363	附錄一：舉止與勞資關係的非正式化
371	附錄二：論伊里亞斯與非正式化理論
391	參考書目

的舉止符碼與自我調整如何影響最終成為全國習癖之混合體的類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句更短的總結是來自對「國家性格的警語：在一個特定的國家裡，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如何彼此相處」(Goudsblom, 1998: 106)。

螺旋狀的非正式化過程： 非正式化與再正式化的階段

權力不平等與權力機會的縮減，一直都與各種類型的非正式化緊密相關，而其中的一些又格外引人注目。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紀結束時，至此，主流的正式化(一股邁向更加廣泛、更加詳盡，並且更加嚴格的舉止與情緒機制的趨勢)因為長期的非正式化過程而顯得黯然失色。

非正式化的過程向來並非直線發展的；而是以形成好幾個波狀的演進，或是瞬間突然冒出變化，進而加速形成這一股走向非正式化的總體趨勢。在研究的四個國家中，此一舉止與情緒機制走向較不正式或僵化的總體趨勢遂成為所謂的「(十九)世紀末」(Fin de Siècle)或「美好時代」(Belle Époque)的主流。到了「咆哮的二〇年代」開始加快其速度；然後是一九六〇年代以及一九七〇年代，這個「情感革命」又再次加速。每一次波狀演進、或是瞬間變化在此一趨勢每一輪加速的期間，就有來自範圍越來越廣泛之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投入其中。本章一開始將描繪本研究所限定的這個期間，由舉止書籍作者和一些探討舉止書籍的作者所觀察到的，非正式化及再正式化(reformalization)的各個階段。其次，本章將針對長期的非正式

化過程中這些短期的階段，與社會解放與整合過程中各個階段，闡述此二者的關聯。

壹、(十九)世紀末

根據大衛朵夫的看法，到了十九世紀末，「良善社會中不同『團體』(sets)的擴大與隔離，讓在世紀中一直被強烈要求的僵化性行為符碼終於可以鬆一口氣」(Davidoff, 1973: 66)。有許多舉止書籍的作者同樣也觀察到此一非正式化的過程。舉例來說，在一八九九年，一位德國的作者寫道：

謹慎的觀察者將會注意到，較之稍早的時候，社交關係已逐漸變得較為不正式許多，亦即較為自然不造作……這一點無疑地是因為在藝術、科學以及生活等方面有一股爭取自然本性的整體趨勢……如今我們經常會聽到老一輩的人說：「在我那個年代，哪有誰敢這麼說或這樣做」(Adlersfeld, 1899, 引述自 Krumrey, 1984:413)。

最常被提到的例子就是她們已經從下述這種傳統看法中得到解放，即女性不再必須等待男人來開口說第一個字，然後她才能接話(Adlersfeld, 1899, 引述自 Krumrey, 1984: 354-5)。

在美國所謂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由新的「財富帝國的擁有者(或者更正確地說，以及他們的夫人)來幫忙掌握當時的社交節奏」，而「『淘金熱(gold rush)』將原本排他的良善社會的門戶撞開」(Schlesinger, 1946; 28)；豪伊霍爾(Florence Howe Hall)注意到：

在紐約經常可以看到一種似乎是當地所特有的愚行。就是原本是相當可敬而又舉止得體之良善社會成員的女性，竟然去模仿一個放蕩、不拘謹階級的穿著，因為她們認為這麼做可以表示她們懂很多。因此經常可以看到一個外表文靜的中年婦人，卻染了一頭耀眼的金髮，穿著十分賣弄的服裝，那一身行頭和裝扮者之間的不協調通常十分驚人(Howe Hall, 1888, 引述自 Miller, 1967: xi)。

豪伊霍爾是屬於那種將禮儀視為一種藝術來呈現的作者：《取悅的藝術》(*The Art of Pleasing*)以及《討人喜歡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Agreeable*)。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評論道：

可以稱得上是藝術的禮儀會形成一種氛圍，是一直以來用單調枯燥的方式來將禮儀視為一種非官方的法規時所缺乏的。隨著美國文明逐漸成熟，人們越來越尊重文化關懷，也越來越能敏銳地感受到就生活的優雅度而言，他們自己的國家遠遠落後舊世界(Schlesinger, 1946: 34-5)。

在美國，炫耀性消費(Veblen, 1979 [1899])以及嘗試著模仿歐洲有閒階級(leisure classes)的各個方面，可能事實上「通常會相當駭人」。其理想可能比較傾向於貴族式的而非「自然不造作」，但是在其強調藝術與戲劇時，這一股趨勢卻展現出許多非正式的特質來。

在二十世紀初期，一位英國作者不只觀察到類似的趨勢，而且也對伴隨著整個二十世紀的非正式化過程表達其關切：

play 戲耍

近年來，在我們身邊發生了一個關於日常生活舉止的重大改變。早期維多利亞時代的男孩個個都是講究禮儀的小傢伙。他會叫自己的父母親「先生」、「女士」，絕不敢在餐桌上帶頭起話題，也鮮少加入談話……我們不希望看到那個時代的繁文縟節重新上演，但是很可能我們……在相反方向上又犯了錯(Armstrong, 1908: 187-8)。

這些只是從許多顯示出在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之際，非正式化的過程變得越來越明顯的各種例子中所選取出來的一部分。

貳、咆哮的一九二〇年代

接下來這一則引自一本荷蘭舉止書籍的引文，充分展現出一九二〇年代的那一波非正式化浪潮，而作者也相當正面地回答了究竟我們是不是「在相反方向上又犯了錯」這個問題：

半個世紀以前，女人的地位與當今大不相同；親子關係也與今日截然不同；這些巨大的改變的結果就是舉止也全然地改頭換面了。所有的生硬僵化與矯揉造作(mannerism)都從當今的社會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負責任的放縱(carefree abandon)。我們應該像對待昔日誇張的禮數一樣地對此嚴加抨擊……

在歷經上一世紀僵化的正式性之後，時下的反應傾向於

走向另一個極端。要一般人採行中庸之道根本不是難事，他們甚至自動自發就會這麼做(Kloos-Reyneke van Stuwe, 1927: 6, 9)。

透過這幾句話，我們依然可以聽到自由的精神，但是作者更加關切的是此種自由精神的極限。一九二〇年代當紅的「漫不經心的放縱」^{carefree}則已經在一九三〇年代被淡化，至於其他的則被整合到主流符碼中。^{無拘無束}

在一九二〇年代，德國普遍發生了一些不幸的社會事件——犯罪率和自殺率上升，而且也較其他國家更加嚴重。因此，沒有多少個德國作者會提到「黃金的二〇年代」。在舉止書籍裡提到戰爭是取得更大自由的手段^{造成?}。一位作者以不同階級的人在戰壕裡結識彼此來說明戰爭的影響。作者提到，透過這些作戰的經驗，讓這些「外在的階級差異」因而消弭，而「瞭解內心」的重要性受到提高(Weißenfeld, 1927: 131, 116)。

一位英國作者也提到戰爭，但是維持在一個較為一般性的層面上：「戰爭已經改變了我們許多珍惜已久的習俗。在某些方面，如今我們得以享有比起以前所能容許的更大的自由」(Cassell's, 1921: v)。另一位作者觀察到戰爭帶來的其中一個可能影響¹，但是卻不怎麼肯定那會是正面的影響：

男人在擁擠的公車或火車上讓出座位的習俗並不像十

¹ 英國歷史學家丹澤菲爾德持反對的見解：「戰後這十年普遍出現不知節制的行為，我們多半認為那只是戰爭的後遺症，事實上早在戰前就已經開始了。戰爭讓每件事都加快了腳步——不論是政治、經濟、或是行為——但是卻並未憑空起動任何事情(Dangerfield, 1970 [1935]: 14)。」

沒有得到女性的正式禮儀回春
 年前那麼顯著。或許是與戰爭以及女性地位改變有關。或許是這種不獻殷勤的作法反而讓許多女性接受，當成是（對於女性的尊重）。又或者只不過是「舉止變粗魯（coarsening of manners）」（Troubridge, 1931 [1926]: 319）。

相對於這種「舉止變粗魯」的說法，還有一種看法將同樣這個行為視為是高度敏感（heightened sensitivity）的表現。該作者承認「比起幾年以前，時下的流行更加有彈性——或者換個說法就是『不拘謹』（loose）」（Terry, 1925: 18）。她指出女性直到最近才甫獲得自由，因此可能每個人都奉之為圭臬的就是「表面上最不在乎的人事實上就是最為敏感的人——粗糙堅毅的外表只不過是隱藏真實情感的斗篷。這種現象經常出現在年輕人身上，而他們事實上可能是自我意識極強，而且極度緊張」（Terry, 1925: 10）。這裡，「變粗魯」可以解釋成是為掩飾高度敏感的外在防護衣。縱觀這整個世紀，這兩種看法一直伴隨著非正式化的過程。

另一位作者避免上述的兩種極端看法，而採用較為實事求是的口吻：「確實，往昔關於說話和行動的一些正式性都已經消失了」（Burleigh, 1925: xi）。該作者似乎相當瞭解良善社會的情況，而有一點擔心：

在「小團體」裡已經被接受成為一份子的成員之間，存在著一塊兒的情誼，而容忍尺度之寬可能是令新進者為之側目的地步。社會上任何一個階級都可能有這麼一個讓人熟悉而且能放心的地位，容許對其自己特有的社交習俗與關切享有充分的自由……當今習俗的「彈性」不該被當成是僭越良好品味界線或是疏忽男女同伴的騎

士精神、獻殷勤或體貼的理由，不論其身份如何皆然（Burleigh, 1925: xv）。

對於「彈性」的關切同樣是基於此觀點，即這種更大的自由通常意味著令人困惑的錯綜複雜：

當今婦女的生活一般而言已變得較為自由，然而在~~某些~~方面，~~比起~~從前的活動，不論是社交或是其他方面的活動，都受到較多的限制。而關於那個鮮少會出現錯綜複雜情況的年代，因為她作法上的對錯都有制訂得如此明確的法規，但是如今關於遵守傳統習俗的規則變得更加複雜而令人困惑（Burleigh, 1925: 229）。

這些錯綜複雜同樣也和演變的速度有關，而名符其實地形成一陣突發的非正式化旋風：「才不過幾年的光景，社交事務就已經變得如此不正式、也不傳統許多」（Devereux, 1927: 11）。

在美國，波斯特女士在其舉止書籍的初版中觀察到「大約二十年前非正式性的年代到來，自此之後就一直在突飛猛進中」（Post, 1922: 81）。史列辛格爵士將艾契勒（Lilian Eichler）一九二一年的舉止書籍刻畫得相當深刻。他提到艾契勒：

從舉止革命的一開始就著眼到好的一面……她嚴詞撻伐「另一個世代生硬的正式性」，主張較為簡樸的方式「既明智又有益健康，創造出一種隨和自在的社交對話，而不會感覺到生硬的正式性以及限制」。此外，她強調，「新的禮儀不會『白紙黑字地規定』。而是提供建議，建議的內容有當代走向為基礎，而又隨著演變的情

況與背景而調整」(Schlesinger, 1946: 53)。

在一九二四年的一本舉止書籍裡，作者在一個標題為「抽煙喝酒的女孩」的小節裡生動地描繪在咆哮的二〇年代所發生的演變：

抽煙、公開或私下喝雞尾酒、整夜跳舞而早餐與某個同性戀派對在某個營業一整晚的小吃店解決，或者在某個同性戀圈子的成員家裡早餐，這樣的年輕女孩並非美國良善社會出身名門、教養良好的女孩，即便她出入副刊上知名的流行界，偶而可能是來自名門家族。但她絕不能被視作良善社會新人、小鎮裡的校友、或是大都市裡妙齡少女的模範。在正常的家庭裡總是偶爾會出現一隻不受羈束的野鳥，就像是羊群中偶爾會出現一隻黑羊，但就是當社會容忍這些麻煩製造者的行為，並且將這些反常的行為當成是轉瞬即逝的爵士狂熱時，讓那些其實是很好的女孩的雙親變得沒有安全感，而良善社會的色彩也被簡化到最低限度……從十七歲到二十一歲的……好女孩……這女孩不在公開場合中抽煙，也不喝雞尾酒，不沈淪於「調情的派對」，從不聽粗俗下流的故事，更不用說從她嘴裡說出這樣的故事，她們克制自己，不去批評那些較為軟弱或較為愚蠢的姊妹們。她們這些姊妹們相信，惟有從爵士年代稍縱即逝但誘人的面貌中，才能找到年輕人所追求的「美好時光」(the good time)(Wade, 1924: 278-80)。

這個「美好時光」的概念以及下一個世代所謂的「享樂道德」(fun morality)(Wolfenstein, 1951)還是不被認可，但是其誘惑

gay
女孩的

談
論

力已經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只不過接下來就是大蕭條時期(the Depression)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

參、從一九三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

在一九三〇年代：

女性不再想要試著讓自己看起來像是男孩子，反而更加突顯她們與男人的差異……新維多利亞時代(neo-Victorian)的流行……表現出當代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安全社交生活的懷舊之情，伴隨著在那些富裕的女性之間，一窩蜂地想要在她們能力許可的範圍內儘量生育小孩：在二〇年代多產代表著粗俗(Graves and Hodge, 1941: 278)。

這些作者，也就是英國的歷史學家，談及「維多利亞時代再度流行」，並論及事實上一九三〇年代將一些新型態的整合帶進傳統裡面，形成一股在非正式化之後的再正式化走向。以下這一則摘自一本荷蘭舉止書籍裡的案例，說明了這種與傳統的再度連結：「如今，既然有如此多的文明需要我們將之從搖搖欲墜的往日榮耀中拯救出來，比起戰後的黃金年代，更重要的是再度與正確的舉止建立連結」(Haften, 1936: 10)。在此期間，一些作者傾向於強調非正式化趨勢的延續性(continuity)，其他人則比較強調其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兩邊陣營裡都各自有不少的擁護者。一位美國作者提到：「大家都知道過去這三十年當中風格上已經起了重大的改變。然而，卻沒有多少人

知道在過去這六年裡也有轉變」(Eldridge, 1936: 177)。如前所述，喬布里琪夫人在其一九三九年新出版的舉止書籍裡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標題就是〈新禮儀的名字就叫做非正式〉。在其一九二〇年代的英文版本中，她還在苦思「舉止粗俗化」的可能性，但是等到一九三〇年代結束時，她顯然發現非正式化還在持續著，其延續性顯然高於其不連續性。喬布里琪夫人觀察到人士如何讓「禮儀變成是他們生活中某種令人害怕的妖魔鬼怪」，她提到「我們的祖母們」，對於「這些可親的可憐人來說」，禮儀就是：

一種妖魔鬼怪，你知道，在那個歡樂的「一九九〇年代」，情況說實在的並沒有好到哪裡去，到處都是禁忌，留下名片的作法更是讓人吃盡苦頭！但是，如今，一種相當新潮的精神已悄悄潛入不成文的法規當中，影響我們所知道的禮儀的內涵，讓我們在這麼一個優雅的年代裡，忍不住就想要說「沒什麼不可以！」(Anything goes!)當然，不盡然如此！特別是在吾國，某種正式性依然當道，但是，整體而言，我們可以安全地說時下非正式才是正道(Troubridge, 1939: 7)。

在該章裡有一小段是討論「質樸(simplicity)——這是當今社交舉止的關鍵字」，並且在結尾時呼籲：「採取一種混合的路線，介於舊式禮貌和新式的非正式之間，這樣我們才永遠不至於誤入歧途」(Troubridge, 1939: 11)。喬布里琪夫人主要提到諸如「鑲金邊的菜單、事先小心翼翼地寫好內容、呈現出至少六道大菜」等那些不重要的僵化正式性已消失，「不再需要臂挽臂的那一套大陣仗，只要讓賓客魚貫走進用餐室裡即

可，至於順序隨他們高興」。

愛德華時代之正式性最後據點的名片盒，依然發揮其功用，而且是社交生活上具有無足輕重的功能，但是即便是在此地也放鬆許多，不再要求那麼嚴謹。別擔心，比方說，你被什麼事耽擱而無法在規定的那十四天內登門回禮，或是某位女士在收到你的名片之後遲遲沒有回音，千萬不要驟下結論，以為她不想認識你！遵照新禮儀的人不受這些恐懼困擾。如果有任何人在超過嚴格的拜訪時間(三點到五點)突然登門造訪，然後留下名片，或是待得比習俗上的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要久一點時，他們也不會揚起眉毛(Troubridge, 1939: 10)。

以上這些舉措對於當今的讀者而言或許似乎並沒有那麼不正式，但是本書的所有讀者絕對能感受到那種解放自由後的喜悅。此外，這種鬆綁可能在英國會受到更大的歡迎，因為該國相對來說對於進入良善社會的把關的機制，較為嚴格而細膩，而其社會控制也較為苛刻。

肆、週期化的課題：兩次世界大戰

在一本談論美國舉止的歷史的著作中，作者史列辛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馬上針對社會習俗提出權威的斷言，「正式性將被野蠻的叫囂推到一邊」(Schlesinger, 1946: 62)。由於其著作是在一九四六年出版，此一觀察大概主要是說明「擺脫戰時的行為及其當時的感受有多麼令人難忘。然後，要是將距離

放遠一點，調查更長的一段期間，就會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是扮演著導火線的功能。我們可以說，就整個二十世紀舉止與情緒調整的符碼其演變來說，兩次世界大戰及其餘波，似乎對於整體的趨勢幾乎沒有任何獨立而持久的影響。

這種整體延續性而非不連續性的觀點似乎也是羅斯曼 (Ellen Rothman) 所觀察到美國^{追求}行為的歷史中，所呈現出週期化之現象的本質。她描述，在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三〇年之間，禁忌快速受到衝擊與侵蝕，接著是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間變化較為平緩而漸進，以及在一九六五年之後，重新又崛起一股非正式化的浪潮 (Rothman, 1984; 287)。類似的週期化的現象也出現在康西安 (Francesca M. Cancian) 的研究 (Cancian, 1987) 以及康西安與戈登的研究 (Cancian and Gordon, 1988) 當中。後面這兩位社會學家注意到：「輿論調查……顯示當代的規範在一九二〇年代加快腳步，在大蕭條時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沈寂下來，然後在一九六〇以及一九七〇年代又再度加速起來」 (Cancian and Gordon, 1988, 330)。他們的結論係得自一則針對一九〇〇到一九七九年間，婚姻顧問的文獻中隨機樣本所做的分析：「美國二十世紀當代規範的長期趨勢與走向對於多元化更大的包容的整體文化轉變有關」 (Cancian and Gordon, 1988, 333)。此一非正式化的長期走向被認為與整體的解放有關：

要是我們考量整個二十世紀，而非只是單就最近這幾十年，我們將會發現呈現出一種與政治解放與壓迫的浪潮有關的之字狀變化。當政府以及既得勢力機構的權威遭到挑戰時，丈夫對妻子的權威也跟著受到挑戰 (Cancian and Gordon, 1988, 337)。

zigzag

他們對於這些出現在「一九二〇年代以及一九六〇年代晚期」之波狀變化的說明 (Cancian and Gordon, 1988, 313)，隱然地確認了戰爭的野蠻 (barbarity) 確實對舉止與情緒機制的整體發展有些許的重要性。

伍、情感革命

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及一九七〇年代，出現無數多個例子，顯示被挑戰的權威與對於「老得令人厭惡的」 (icky old) 舉止的「不真實」 (inauthenticity)、「膚淺」 (superficiality) 以及「虛偽」 (falsity) 的批評。美國一九六〇年代的例子則是所謂的反主流文化，包括民權運動、黑豹黨員、藍色牛仔褲和工作襯衫、長頭髮和迷你裙、「去你的徵兵令」 (Fuck the Draft) 以及其他「髒話抗議」 (dirty speech protests)。克米爾 (Kenneth Cmiel) 研究美國最高法院在夏普林斯基控告新罕布什爾州案 (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 1942) 一案的判決，該案的被告因為叫某人是「該死的敲詐者」以及「該死的法西斯主義」而遭到有罪判決。言論自由逐漸取得上風，贏過在文明社會中對於語言優美 (verbal niceties) 的要求，克米爾的結論是：「這是美國社會正在進行非正式化的法律版本」 (Cmiel, 1994: 284)。

當然，站在一九六〇年代運動的最前線，舉止書籍並未受到歡迎。它們被認為是權威與虛偽的代表，並且在那個關鍵的十年裡遭到抨擊。然而，多數的舉止書籍的作者嘗試著找到折衷點，儘管是以不同調的聲音來訴求。

在一九六〇年代晚期，德國的一個實事求是的聲音提到：「對我們祖母輩而言是無法接受或是『不得體』的事情多半已

經不再會冒犯到我們，而我們童稚時期所接受的教誨或忠告也有一部分失去其有效性」(Haller, 1968: 93)。一本出版於一九七〇年的書籍裡出現類似的觀察，只不過其所採取的口吻充滿了更加強烈的情緒：

突然間，一個年輕人出現在舞台上，他不再能容忍那些「因為是由上面的人發佈的，所以就要接受的」規矩。他們要求理性與意義：「為什麼我們應該？」這個問題應該要提出來……特別是體諒、柔順以及仁慈才是當前所有社交接觸時所需要的，而非過時的禮儀中空洞的正式性(*Umgangsformen Heute*, 1970, 引述自 Krumrey, 1984: 186-7)。

一本出版於一九七三年之書籍的作者也似乎受到這種影響。在前言裡，此作者首先提出幾則關於近來演變的例子，例如國務大臣不害羞地與學生們坐在地上討論；戀愛中的情侶們在公開場合中互相有深情款款的手勢；而牧師沒有配戴領結在電視上對觀眾談話。然後他們聲稱：

自由、最重要的就是自由[Freiheit, Freiheit über alles]……不論往哪裡看，到處都在改變……被掏空了的習俗，以及了無新意的正式性，全都被掃地出門了——現在，有意義、合理的形式更加明顯地冒出頭來。若是沒有這個舉止的基本架構，人類關係將無法被組織起來……年輕人的抗議活動帶來一劑自在與非正式性，甚至是隨心所欲地走進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裡面(Wachtel, 1973: 10)。

相較之下，**英國**的作者則比較節制。以下面這一則為例：

電視、電影、某些報紙與週刊、小說與戲劇以及自傳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打破究竟什麼可以在公開場合中討論的禁忌。特別是這關係到過去那些無法討論的內容、親密的性經驗、對於暴力的細節描述，以及各種肉體經驗與情緒(Edwards and Beyfus, 1969: 187)。

有一本書籍，代表著典型英國「挖苦」機構或人物的習俗，書中提到以下這一則浪漫化中下階層的例子：

試著走出你平常習慣的那個世界，認識一些你成長過程中陌生的人。每個人都有其特殊之處……比方說，吉普賽人，……即便是乞丐或流浪漢經常都有其迷人魅力。他們永遠都有一肚子關於他們如何變成現在這德行的故事可說。馬戲團的人也很有趣(Kandaouff, 1972: 25)。

對這種迷人魅力的讓步等於是承認需要相當的信任與強烈的情緒調整：「不論是多麼駭人聽聞的事，你都可以做到，只要你知道如何輕鬆地應付。如果你能維持住尊嚴，不論你做什麼，都不會讓你感到難為情」(Kandaouff, 1972: 27)。在這一段文字當中，作者將維持住你的尊嚴以及避免感到難為情，當成是必要條件。任何「試著走出你平常習慣的那個世界」的嘗試都是嘗試著除去控制(decontrolling)與鬆綁(unwinding)，但是事實上卻當然應該要維持著控制的狀態(remain controlled)。所以這顯然是一種有條件的「沒什麼不可以！」(Anything goes!)：一種經過控制的去控制化(a controlled decontrolling)。

其中一種過去無法討論，但如今變成是吸引人的話題，代表的不是較低的階層，而是較低的「動物性的」(animalic)功能的話題，就是排便和排尿。如今，在「脫身到盥洗室去」這個標題下，作者提到：「脫身的技巧已經有相當大的改變……許多中產階級的委婉說法，例如：『the can』、『the John』、『the loo』，這是目前普遍的說法，但是我們注意到有越來越多的人乾脆直接問廁所在哪裡」(Edwards and Beyfus, 1969: 192)。過了十幾年以後，在一篇討論歡迎賓客的文章中，作者還是認為有必要這麼說：「務必要讓所有的賓客知道廁所在哪裡，因為可能有哪個害羞的傢伙不敢開口問」(Penelope, 1982: 12)。即便是遲至一九九〇年代，這個禁忌或許已經結束了，但是這個話題依然吸引人：一本舉止書籍裡就有一章標題為〈盥洗室〉，裡面提出這個問題「關於上廁所目前有什麼應該要注意的禮節？」(Killen, 1990: 130)。至於在研究的其他國家則完全對此不感興趣。

在荷蘭，代表著非正式時代精神的聲音短缺。純粹是因為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二年間，幾乎沒有任何舉止書籍出現在荷蘭。只有唯一的一本於一九六七年出版，而其可說是奏起了「情感革命」的前奏：

我們的祖母和曾祖母們四處摸索著禮儀夫人的符碼而前進。該符碼包含著許多如今我們看來顯得愚蠢的內容。當時還有其他的狂熱者追求正確的禮節，同樣地，當中有許多也是如今在我們看來顯得愚蠢無比。但是有一樣東西也被遺忘了，那就是：我們不該緊抓住法規的文字，而忘了其中的精神。一輩子亦步亦趨地遵守禮儀夫人的腳步，對於禮儀夫人所指的那條路一吋也不敢偏離，這樣的人(說好聽一點)就是被牽著線的木偶(Eyk, 1967: 3)。

陸、一九八〇年代以及 一九九〇年代：再正式化

在研究的四個國家中，那一股非正式化的旋風是在介於一九七〇年代結束以及一九八〇年代開始的這一段期間謝幕。在這個新的階段，某些非正式化的支流依然在洶湧著，但是整體來說，再正式化重新取得上風：主流的舉止與情緒機制走向更加嚴苛、層級結構以及合意的共識。對於紀律、法律以及秩序，出現了一些新興的面向，而性革命被徹底宣告結束。

在英國，對於舉止重新燃起一些新面向的興趣，而且以典型英式戲謔的幽默語言出現在書名與次標題上，比方說：《給非常粗魯的人的禮儀書》(*Etiquette for Very Rude People*)以及《惡劣的行徑，或者如何不要重新獲得邀請》(*Bad Form, Or How Not To Get Invited Back*)。其中撰寫《惡劣的行徑、如何不要重新獲得邀請》一書的作者以嚴肅的口吻寫道：「時下的人似乎對於禮儀的課題感到有史以來最大的不確定」，然後他接著透過「得體的越軌行為提出忠告」來整個扭轉這種情形(Brett, 1984: 7)。上述第一本書的緒論中提到：「這世界正在向下沈淪。我們只能以讓我們在往地獄的旅程中，還能看起來不錯的方式來舉止」(O'Rourke, 1984)。另外還有一位作者寫道：

就是在難堪的時候我們才最需要得體的舉止，同樣地，正是在這麼一個末世的時代，我們更需要良善舉止的指南。我們不能因為有人可能在我們瘋狂的茶會當中砸一顆子彈，而被嚇得不敢送上最好的茶，或是以最佳的舉

止來進行最得體的對話——永遠都是如此。正式性應該要加以維持，從搖籃裡到進墳墓都是——甚至是踏進墳墓以後亦然(Crisp, 1985: 11-12)。

這一股非正式化的旋風逐漸放慢下來，而這事實上就像其剛開始時一樣馬上就被注意到。「我們的目標在於建構一個改良過的架構，用以增加歡樂交流的機會，卻不至於限制自我表達的樂趣以及獨特性」(Debrett, 1981: 10)。以這個想法為基礎而建構出來的一項觀察就是：舉止已經從固定的規則變成是具有彈性的指導原則——而且，在我進行研究的國家中，不止一個國家有這個現象。以下這一則引文就是英國的版本：

這裡所提供關於禮儀的指導原則，不該被當成是絕對的。本書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這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我們有必要擺脫糾纏多數舉止與禮儀書籍的絕對主義……良好的舉止應該是有創意的，而且容許改變與調整(Bremner, 1989: 5)。

事實上，在一個各種社交圈各自有形塑功能之更強烈分化的世界裡，確實是需要相當程度的可變性或彈性：

期待新進雇員能適應「該國的舉止」。舉例來說，藝術與媒體的世界傳統上比較非正式，二者都是與穿著以及談吐有關。至於銀行業與行政部門傾向於在服裝上較為保守，並且在行為上嚴格依照層級組織來要求。但是即便是在這些廣泛的輪廓下，各個公司還是有所差異。而以下這個建議應該依照各個公司的情況而修正和調

整……基本且經常被提出的社交建議也適用在這個領域——亦即個人應該要盡可能地輕鬆而自然地舉止，遇上難應付的情況則要見機行事(Debrett, 1981: 251)。

在一九八〇年代，一些舉止書籍的作者試著找出比舊有、較為簡單、而且固定的規則，所能提供更多選擇和選項，且可以發揮支持功能的一些新「組織原則」。舉例來說，在一個標題為〈同志的指導方針〉章節裡提及：

如果你能嫻熟那個高於你一階之階層的風俗習慣及其原則，你很有機會能攀爬上那個階層。今天，塑造不同行為類別的與其說是階級，……還不如說共通的經驗才是緊密串連彼此的繫帶。在自然科學的世界裡，這種根據相似性而歸類的方式就叫做支序分類學(cladistics)。社會支序分類學認為共通的行為類型係源自共通的經驗，每一個「種類」呈現出不同的禮儀或舉止上的問題(Courey, 1985: 7-8)。

總的來說，英國舉止書籍作者以相當超然的立場來撰寫非正式化浪潮的演變，以及正在發生的再正式化。他們超然的口吻讓這些浪潮在他們國家裡看起來落差不是那麼的大，而比較和緩，並且／或比較不是那麼激烈，並且／或收到比研究的其他國家更多的節制。每一種可能性都密切相關於英國的國家習癖(就像老生常談的那樣「沉著冷靜」(imperturbable)，以及英國有強烈的將新團體整合進政治權力圈裡的傳統。

一本初版發行於一九七〇年之德國舉止書籍，作者於修正並重寫的版本中，刪去了諸如「如果年輕人在適應這個世界上

有困難，這通常是因為家教不好」(Umgangsformen Heute, 1970: 34)之類道德勸說的言論。許多帶有非正式化色彩的建議則予以保留，比方說：「謝絕形式的權威者，才能取得真正的權威」以及「恐懼事實上是假權威的工具」(Umgangsformen Heute, 1988: 41-3)，而且：

少點正式性 ~~愈多~~ ^{多些策略} 愈是手法老練(tact)！時下流行的舉止容許個人得以自由援用其他形式到手法(tact)上可行的地步。選擇這種風險總好過將昨日的正式性僵化。正式性讓你處處受限。流暢的舉止鼓勵各個世代的團結合作以及人類同胞們的理解。
相互

在發表了歡迎該書第一版的言論後，新版接著又進行回顧，試著解釋一些變動：

一九七〇年代顯示出〔這個如同謝爾斯基(Helmut Schelsky)所說的〕充滿懷疑的世代(a sceptical generation)是如何學著去欣賞人類交流的情感。要從這種團結的情感中找到力量再度成為一個值得嚮往的目標。這個世代的悲劇就在於，截至一九八〇年代為止，成千上萬的人失業，或是並未找到職業訓練的入口。因此，找尋工作的年輕人意識到良善舉止能帶來保障的這個優點(Umgangsformen Heute, 1988: 16)。

另一位作者在其前言中提出類似的說法：「任何人想要有所突破，不論是求職或是社交方面，都需要良善的舉止。因此，在近幾年來舉止再度獲得高度的肯定，這絕非只是一種偶然」

(Löwenbourg, 1987)。另一本書的封底印上大寫字母的「舉止又回來了」(Wolter, 1990)。另一位作者則冷淡地將此問題爭議化：

舉止真的又回來了？這個問題實在愚蠢。舉止無所不在。荷蘭人早就注意到舉止，更別提古羅馬人。只不過是不一樣的舉止。會問這個問題的人必然是認為只有他們自己以及他們舉止(或是他們所屬的團體的舉止)才值得一提，因此，「舉止」或是「良好的舉止」只會標示出那些我們熟悉的……這是停滯的行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改變，我們的舉止也會跟著改變(Schönfeldt, 1987: 13)。

這些觀點是以機械論的方式來解釋，彷彿是有一個「不斷輪流的法則：嚴格而節制的正式性，接著就是沒有邊界的自由，如此不斷輪流交替」(Schönfeldt, 1987: 18)。作者接著說，直到最近這幾十年，這種交替的狀況才變得比較沒那麼極端，因為在當今公共的世界，人們可以選擇：「到底是該選擇非正式或是選擇正確，這就是問題的所在」。在此，作者避免使用「formal(正式)」這個字——很可能是因為過去對於正式性的攻擊如今記憶猶新，同時也因為這個字似乎不能再反映出這個選擇所帶來之複雜性的增加。因為，「幾年以前……非正式行為展現在不拘禮節的人身上，而正確的行為出現在端正的人身上，這個實際分割世界的準則早已下復見了。左派的人戴著領帶，右派人士反而解開襯衫」(Schönfeldt, 1987: 213)。這些演變意味著一種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也與具有形塑功能的明確核心之消失有關：「我們不再擁有一個能夠發展我們集體欲望和對於彼此間期待的良善社會，我們只剩下電視機了」(Schönfeldt, 1987: 26)。

在美國，舉止書籍的作者們不但注意到最後這一波非正式化的旋風，而且指出其諸多差異，包括事實面的特點：「我注意到六〇年代的禮儀有巨大的鬆綁現象，直到最近才開始反彈，往偏向更加正式性(more formality)的方向發展」(Young Stewart, 1987: xii)。更加正式性意味著在一九八〇年代，舉止書籍十分暢銷：「我們或許可以說，在過去這大約十年的時間，禮儀突然在美國風靡起來」(Barrows and Weiner, 1990: ix)。這也意味著有許多作者觀察到缺乏紀律的現象。其中一位持這種看法的作者波斯特女士就責怪心理學家：

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及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過份時興建議父母親當他們小孩的「朋友」(pals)，而且還倡導管教小孩將妨礙小孩品格與人格的成長的觀念。小孩直呼他們父母親的名字、和年長者見面時從來就不必握手，也不必說「請」、「謝謝你」，或是堅守其他任何的社交禮俗。結果這些小孩並沒有長成成熟、獨立的成年人，而變成是懶惰、迷惑的個人，缺乏對他們父母親與對整個社會的尊重。幸運的是，當今年輕的父母親已經注意到缺乏紀律的後果，並且扭轉過去的那種趨勢。如果閣下，為人父母者，相信你的經驗、你的教育，以及你的態度值得模仿，自動自發跟隨而來的就是尊重(Post, 1984: 288)。

這一股舉止熱潮中的新星，通常以有趣的方式來維護傳統的便是「禮儀小姐」。正如同謀殺案推理小說中的馬波小姐(Miss Marple)，在禮儀的推理界中也有禮儀小姐。這種比擬可以見諸以下的句子：「沒什麼不能解決的，就讓禮儀小姐來幫忙」(Martin, 1983: 290)，以及諸如《一般禮節：禮儀小姐解決

難倒傑弗遜先生的問題》(*Common Courtesy, in which Miss Manners Solves the Problem that Baffled Mr. Jefferson*, 1985)之書名。作者攻擊非正式性的例子早就有跡可尋：「廣泛使用名字、運動服飾、有聲娛樂，以及其他在勞動界的『非正式性』特徵，這些均助長了『事實上沒有誰有必要去為別人提供服務』的假象」(Martin, 1979: 417)。在一九九〇年代，馬丁(Judith Martin)對於良好舉止的偏見被評論為「幾近於呼籲振興……禮節優先於民權的觀念」(Cmiel, 1994: 290)^②。

儘管禮儀小姐流露出對於非正式性的負面評價，但是一九八八年探討《服務禮儀》(*Service Etiquette*, 1988)的作者使用非正式這個詞彙，以概括性的方式描述一個世紀以來所有的社交上演變：「過去明確出現幾次社交上的演變——比方說，維多利亞時代與爵士樂時代。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今天是個非正式的時代」。作者接著除去負面的意含：「非正式並非意味著對於優雅生活造成阻礙」(Swartz, 1988: ix)。

在荷蘭，經過大約十五年的出版斷層後，在一九八二年以及一九八四年結束的期間新出版了九本禮儀書籍(Wouters, 1987)。可見其需要量相當可觀，而寫作的口吻也透露出一種相當有自信的良善社會的精神：

不同於法律的世界，在社交世界裡沒有以強迫性的措施來讓人們回到正軌，並且將人們留置在正確的位置上。但是社會確保不遵循得體的行為規則者(不論是出於粗

^② 在一次私底下的通訊時，馬丁女士告訴筆者，禮儀小姐始於一九七八年，當她時開始撰寫關於開放的法令，以及經常被許多人當成冒犯無禮行為之藉口的速成性交。她稱此為「無禮的舉止」(bad manners)，而且更讓她驚訝的是居然引起許多人的共鳴。

心、缺乏瞭解、或者甚至是不願意)，被排擠在良善社會的分界線之外。從此退出比賽，再也沒有成功的機會 (Groskamp-ten Have, 1983: 5)。

然而，相較於較為過去的禮儀書籍，新書裡顯然透露出一個幾乎是隨口說出的寬容。在一篇前言裡，作者注意到，年輕一代在面對一些規矩時會說：「那樣或許是合乎禮儀的事，但這樣才是我們的作法！」，作者接著說：「當然，那絕對是每個人都享有的完全權利」(Bakker-Engelsman, 1983: 8)。在過去的禮儀書籍裡絕對找不到像這樣的免責條款(escape clauses)。

在新的舉止書籍裡，另一個共通的特色就是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社會平等化過程(a process of social equalization)的痕跡，亦即在不同階級與性別之間的權力差異減少。

過去經常「不論是哪一種情況，都是體貼的女主人或主人有義務，」確保每個人都玩得很盡興。現在的男女主人，除了是備受讚賞的派對主辦人以外，已經變成比較像是同輩中年紀最長者(primus inter pares)，至於事件經過愉快與否則主要是看整個團體，以及每位成員個人 (Grosfeld, 1983: 312)。

另一個不同於過去的舉止書籍而較新奇的是根據舉止因不同關係與狀況而有不同的可變性(variability)。最能明確描寫並闡述此一發展者，莫過於上述引用過的那些作者，他們致力於提供「讓每個人都應該能夠根據狀況而加以詮釋的彈性指導原則——亦即從高度表到平面幾何學的改變」。另一個例子則是：「我們在家裡開晚餐派對，與我們的朋友、親戚，或是做

為客人之公司的總經理共進晚餐。『或是』這個字可能表示著從完全非正式轉變為比較有點正式的行為，就端看和老闆(或是其他特別的貴賓)的關係如何」(Grosfeld, 1983: 223)。也有其他的作者見證到此一發展：「但是冒然舉例可能還是有風險。再一次強調，一切都要看場合、環境和情況而定。對某人來說風趣幽默，換到另一個人身上就顯得粗魯無禮」(Bakker-Engelsman, 1983: 85)。而且：「不幸的是，不可能總是事先準備好答案。有時要運用自己的規矩，自問在怎麼樣的情況最能讓人感到舒服」(Eijk, 1983: 7)。

柒、非正式的螺旋狀過程

縱縱、縱容

特別是在一九六〇年代，非正式化的過程普及到越來越多的人，而讓研究中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包括在內。社會整合與非正式化的旋風都變得極其明顯：(勞工階級、婦女、同性戀等的)「解放」、「平等」、「寬容」(permissiveness)，以及「寬容的社會」變成公開辯論的熱門議題。這一股引人注意的力量讓社會學家施洛特(Michael Schröter)得出相當矛盾的結論：「或許當前的非正式化只是將先前的正式化過程……帶進我們的視野」(Schröter, 1985: 2)。事實上，若非有先前長期的正式化過程，我們實在無法想像會有如此長期的非正式化過程。在二十世紀，不論是非正式化的浪潮或是短期的非正式化階段，之後必然緊隨著一股正式化的浪潮，而在伴隨此一變化的動盪之後，而當浪潮及反向的逆流結合之後，往往是向著由非正式化佔上風的舉止符碼做為方向來發展。因而形成之字形的螺旋狀非正式化過程。

以下的視覺形象或許能說明此一螺旋狀的過程。我們或許

可以從照片裡觀察到舉止持續的鬆綁以及分化：傳統上由一群表情嚴肅、穿著禮拜服的人，擺出僵化的攝影棚姿勢；在一九六〇以及一九七〇年代，取而代之的是放鬆且面帶微笑的人，根據時間(閒暇)和地點來調整其穿著，心血來潮地留下快照(Oosterbaan, 1988)。到了一九八〇年代，除了繼續欣賞放鬆且非正式的照片外，自我的呈現變得有些更加嚴肅而矜持，而且有許多人已改(回去)了，從毛衣和牛仔褲改成西裝和領帶——回歸傳統，同時將新的東西整合進來。

在一九七〇年代有些婦女已經徹底放棄穿著胸罩，此時引進「柔軟」胸罩，或許可以當成是同一個過程之另一個有趣的實例。胸罩是用來支撐胸部，就像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及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依然流行的老式「硬挺」胸罩，並未除去「解放」肉體的形象，或是在視覺上讓人聯想起奶頭。這三種方式(硬式胸罩、沒有胸罩、軟式胸罩)也顯示出從正式、到非正式，又到二者之合成的「辯證性」(dialectical)變動過程。同時，硬式胸罩象徵著以僵化的第二天性來控制「第一天性」，而沒有胸罩與軟式胸罩則象徵著嘗試回復第一天性。

類似的順序也出現在馬甲的發展史上。穿著馬甲始於十六世紀西班牙貴族女性，然後在十九世紀時最為蓬勃發展，並逐漸普及到其他階層以及其他國家。馬甲的普及象徵著提高對於身體的控制——鬆綁的衣服表示不受拘束的道德。在邁向十九世紀末期，如同服裝改革運動中的實例，追求自然的理想與追求美感的理想混合為一。從那之後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鋼骨塑身馬甲只用在失控的女性身體，做為整型外科道具，突破了時下對於美的標準的束縛。這個美的標準越來越對自然的理想(ideals of naturalness)造成遏制，但是卻是有節制的控制：並未過量的女性肉體則多半還是透過束腹緊身帶(girdles)、束帶

(straps)、馬甲以及胸罩來控制。只有到一九六〇年代，女性才終於成功地解放其肉體，擺脫這一類的控制。然而，這並非完全的解放。這顯然是一種經過控制的去控制化，而馬甲對於身體的控制則是自我控制的延續：女性轉而大量地求助於節食、運動、有氧運動、健身、家庭教練，以及諸如整型等其他形態來「改造身體」(working the body)(Steele, 2001; 另請參見 Finkelstein, 1991, 以及 Davis, 2003)。從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馬甲又再度現身：「有形的馬甲變成是社交上可以接受之情色展現」；其「顛覆性的魅力」因為諸如瑪丹娜與高堤耶等人的表演或設計而得到充分的發揮(Steele, 2001: 168-70)。大眾理所當然地認為，穿著馬甲的女性並非需要這麼一件馬甲來控制她們的身體，有形的馬甲被認為是美麗、自然以及自我控制等理想如何彼此結合在一起的象徵。

相較於德國和荷蘭，這一股「改造身體」(working the body)的趨勢似乎在美國和英國格外明顯。這種國別的差異或許是與後面這兩個國家有一段類似清教徒式地更加壓抑控制身體的歷史有關。我們或許可以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英國的一本舉止書籍裡找到這種走向的蛛絲馬跡。該書介紹並探討了代表這一股新趨勢的一個新字彙：「『健美一族』(body-people)：以某種絕對健身之柏拉圖式理想為目標的那些人」，對於這些人而言，「身體與其說是一種性的玩物／客體，還不如說是一種生活方式……所有的健美一族持續不間斷地查看、並討論他們的身體」(Courey, 1985: 115-17)。同一位作者在提供瞭解健美一族趨勢的關鍵時，寫道：

此外，英國的寵物持有一張引人入勝的讀心卡，這在一般歐洲的狗或貓的腳爪上所不曾有的。在這個國家，我們整

體而言並非一個能接受碰觸文化的民族——特別是牽涉到男人的時候。在歐洲，人們可以在大笑或微笑等儘可能自然的情況下碰觸伸手可及的任何人，但是對於英國人男性，可以碰觸的範圍僅限於他的老婆和他的狗。而且整體來說，由狗來做又會更好一點(Courey, 1985: 137)。

如此栩栩如生地將英國人僵硬而沉著的形象延伸到整個身體，充分表達出英國人一成不變地對於第二天性的自我控制(參見第五章第拾節)。擺脫這種僵化以及重新找回第一天性的身體，為那些健美一族提供了可以歡慶的理由和那些健美知識份子(body-intellectuals)思考的理由。所謂的健美知識份子是指與諸如創辦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身體與社會》(*The Body and Society*)等雜誌，以及諸如於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於威爾斯的格拉摩干大學舉辦「控制身體會議」(Controlling Bodies)等全國性及國際性的會議有所相關者(24-26 June 2002, University of Glamorgan, Wales)。

筆者最後一則有關這些短期的非正式化階段以及再正式化和其螺旋狀運動的視覺化(visualization)的例子，就是關於流行舞蹈上的演變。在二十世紀一開始時，流行的華爾茲具體化了當時普遍對於兩性之間和諧的不平等關係(relations of harmonious inequality between the sexes)的理想：亦即由男性主導而女性附從，二者一起創造出和諧的舞步。男性那一方的每一個動作都以女性那一方的動做為前提，反之亦然。在一九二〇年代，華爾茲被認為表現出一種舊式而且較為拘謹的跳舞方式。但是，在該世紀一開始時，華爾茲還代表了與諸如方塊舞曲等過去團體舞蹈的決裂。因此做為一種雙人舞蹈，華爾茲顯然是朝向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邁出一步。事實上，華爾茲是

一九二〇年代個人化舞步的前奏曲。此外，由於華爾茲牽涉到近距離和碰觸，華爾茲也可以說是舞蹈情色化的先驅。然而在當時，華爾茲遭到鄙棄，而新舞蹈(最為人知的就是查爾斯頓舞)備受歡迎，被讚揚為「擺脫早期舞蹈類型的種種限制……，一言以蔽之：個人跳個人的舞」(Viroflay-Montreccourt, [c. 1920] II: 68)。從一九二〇年代末期以來，華爾茲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舞蹈重新又流行起來，其所造成的風靡一直延續到一九六〇年代的某個時期，當個人化的舞蹈再度流行起來，甚至成為主流為止。在個人化的舞蹈中，每一個個人嘗試著隨著音樂與同伴的舞步來調整其舞步。舞者鮮少遵循固定一套舞步；他們的動作較為非正式，也較為有變化。旁人也比較難看出究竟是誰在帶舞、誰在跟舞，也比較難以預測。就算是帶舞和跟舞也很可能有不同層次和細微的變化。如果兩個人搭配得好，很可能在某些時刻，所有那些分開、鬆散的動作似乎一起流暢地移動起來，變成和諧的舞步。這似乎是個人化舞蹈最崇高的理想。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及一九九〇年代之間，舊式舞蹈風格再度復活起來，諸如騷莎舞曲等流行的舞蹈再度與華爾茲的類型相符合。其他許多舞蹈也忠於個人化舞蹈的風格，因而整個二十世紀的舞蹈趨勢呼應了非正式化的螺旋狀過程：更多的變化，就可以接受的選項來說有更多選擇。

捌、非正式化與社會整合的螺旋狀過程：兩個階段

相當大程度來說，我們可以將非正式化的螺旋狀過程解釋成是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團體，在解放與整合過程(亦即他們在

權力核心及其良善社會中的代表性)輪流地加速與減速。在撰寫到有關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並且受到伊里亞斯對於互賴關係(interdependence)不斷擴展的網絡，其所劃分的兩個階段或兩波浪潮的說法(Elias, 2000: 430-4)所啟發，史托克(Bram van Stolk)和筆者也劃分了一個一直持續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的調適與順從的階段(a phase of accommodation and resignation)，以及緊接在此之後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的解放與反抗的階段(phase of emancipation and resistance)(Stolk, 1987: 152-61)。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我們注意到有個和諧的不平等(harmonious inequality)的傳統主導著當時對於關係的理想：即使是諸如雇員與雇主(以及他們的組織)之間等較為具有爭議性的不平等關係，這個主張和諧的不平等關係之理想還是勝過較為主張(階級)抗爭乃是不可避免的激進理想。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迫使既得利益團體主張其權威正當性的壓力開始越來越大。同時，和諧不平等的理想，其影響力也出現快速消退的現象。一個集體解放與反抗的新階段於是展開。同樣也開啟一段比以前容納更多團體的社會整合階段。男女之間、親子之間、年長者與年輕人之間、教授與學生之間、雇主與雇員之間等這些關係全都明顯出現十足的緊張對立。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一個調適與順從的新階段展開，而且越來越清楚地顯現出來。新舊既得勢力團體也透過回歸更大的正式性(包括可接受的非正式性的型態)，而越來越成功地維護了他們的權力與獨特性。所有階層的成員再度以良善社會中更加正式的舉止與生活型態為其基本的模範，來調整他們自己，而且實質上所有的團體更加強烈地將焦點聚集在穩固與維護他們的權力與他們的獨特性上。因此，正式化的傾向再度贏得上風(Wouters, 1986)。

在解放與反抗的階段，不同社會團體之間權力不平等的減

少，助長了更大的非正式性；而在調適與順從的階段裡，穩固或者甚至增加權力的不平等，則促進了正式化以及更加公開地展示出其獨特性。在社會解放、整合以及非正式化的螺旋狀過程中，這幾個階段基本上彼此連貫(而且一起起伏不定)輪流著主宰社交功能的分化與整合過程。當功能分化與社交團體佔上風時，權力平衡上的改變導致最後集體解放的機會、出現解放與反抗的階段，以及讓非正式化普及。事實上，從概括層面來瞭解，這些階段的遞嬗或許可以說是表現出社會功能與團體成雙的分化與整合過程，最後達成更加擴張且更加互相依賴的網絡^③。

當大型的「新貴」團體強迫「舊有勢力」的既得利益團體打開大門而獲得了解放，這個長期的非正式化過程遂成為主流。商業與工業的擴張，連同運輸與傳播工具的擴展，促成了認為舊有正式性太過麻煩的新類型關係崛起。這個現象再度在一九二〇年代出現，當時有許多新貴家庭正在權力核心與他們的良善社會的階層中爭奪一席之地。根據大衛朵夫的說法，主張政治權力之新團體的社會整合，向來是英國政治延續性的力量，但是特別在一九二〇年代，對於新團體的社會同化卻越來越有問題：

在十九世紀末葉，透過正式社會的機制來整合為數不大

^③ 關於整合年代表(chronology)與「遣詞用字」(phaseology)之提案，理論上的討論可參見古德斯布洛姆(Goudsblom, 1996)。至於顯示出，不只在社會科學以外的社交世界，還有在社會學將這些階段正轉變時的一些基本特色予以理論化中，皆可以觀察得到，參見基爾明斯特(Kilminster, 1998: 145-72)。在其分析從一九四五年之後的社會學發展時，他劃分了大約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六五年間的「獨佔」階段，大約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八〇年間的衝突階段、以及大約在一九八〇年到目前為止的集中階段。這幾個階段，特別是最後這兩個階段，明顯呼應了這裡所描述的解放與反抗階段、以及調適與順從階段。

的工會會員和勞工領袖相對來說並不是一件難事。對於新進者而言，顯然透過社交接觸能有政治上的利益可圖，而對於感覺較為敏銳的社交領導者而言，如果能意識到國家的生活當中有些重要的新元素需要加以吸收……但是在戰後，當如此多的勞工階級代表出現，以及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勞工階級文化的忠誠擁護，構成了他們與他們的選民之間主要的連繫關係，許多勞工階級代表甚至拒絕上流社會或中產階級的社交生活 (Davidoff, 1973: 69)。

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及一九七〇年代之間這個解放與反抗的新階段，所有的團體都在社會上興起，幾乎所有的關係都變得比較不是那麼講究層級或正式。福利國家中的大型社會團體的解放與整合呼應了非正式化的走向：舉止的機制迅速失去其一成不變的僵固性與層級的超然性。許多過去遭到禁止的行為模式如今已獲得認可。性慾特質、文字或口頭語言、服裝、音樂、舞蹈以及髮型(所有的表現型態)都展現出一種走向非正式性的趨勢。

在一九六〇年代，一些如今越來越為社會所接受的邊緣團體(勞工、婦女、兒童、青少年、同性戀)逐漸理所當然地認為可以期待一些往好方向發展的改變。這些團體在既有的體制中，其地位不再像是在前一個階段那樣，被認為是過去長期而艱苦的抗爭所獲得的成果。從那之後，他們的地位被拿來與烏托邦的形象來做批判性的比較，並且被期待有個規模更大以及更小的未來。對許多人而言，越來越難將任何一種不平等的關係想像成是和諧的。對於那些逐漸崛起的人而言，和諧的不平等關係之理想，受到他們念念不忘的羞辱所壓抑，儘管在先前

一個階段時他們會盡量壓抑這些羞辱的感覺。現在，由於他們掛念著他們受辱的經驗，於是他們針對「不公平」的差異('unjust' differences)享有「正當化的要求」('justified demands')，因而特別強調在他們自己階級內部的團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科學裡面，當此一解放與反抗的階段開始時，首先劃分出和諧模式(harmony model)與衝突模式(conflict model)，而此種劃分也迅速成為一般用法。在荷蘭，這兩個詞彙也迅速普遍流傳在從政者、商會領導人、解放運動的發言人等之間，甚至一路到學童們的圈子裡。這個劃分法讓邊緣人有機會可以闡述他們對抗不平等的正當性(legitimacy)；他們只不過是「選擇了衝突模式」，這個可敬的策略。過去認為這種衝突與對立中不免伴隨著危險與恐懼，這種看法也反映在和諧不平等的形構理想(figurational ideal of harmonious inequality)上，但如今持這種看法者已大幅減少，而這種以較為僵化且正式的方式，來控制這些危險與恐懼的作法則遭到抨擊，抨擊其過於一成不變，顯露出自負的優越性，並且對於失去權力、地位與自我控制表現出誇張的焦慮。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原本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及一九七〇年代蓬勃發展的集體解放已消聲匿跡了。崛起的階級不再成長，而市場的意識形態(market ideology)則開始普及。這反映出在全球化交織過程中的一個新階段。全球經濟上的演變與國家權力結構的改變不謀而合：從政者與政府開始減少對工會以及社會運動的支持，反而是與商業與管理的既得勢力站在同一邊。從一九八〇年代以後，佔優勢的權力結構只接受個人的解放。渴望獲得尊重和社會攀升的個人，再度強烈倚賴既得勢力的菁英，他們也隨之調整他們的舉止。因此，既得勢力的感覺與舉止更加明確地發揮其做為模範的功能。這種轉變在一九九〇年

代更因為蘇聯政權與鐵幕的倒塌而獲得強化。在美國這個唯一剩下的「超級強權」，優越感不但鞏固了對於既得勢力的「我們認同」，更強化了遵守舉止與情緒中主流機制的要求。在歐洲，緊接在鐵幕崩塌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在某些情況下爆發一些暴力事件，比方說過去的南斯拉夫)強化了恐懼、不安全感，以及無能為力等感受。越來越感受到歐洲國族國家對於全球化進程缺乏得以施加的控制力，這種覺醒刺激人們傾向於認同既有秩序，並且更加關注任何可能對其造成威脅者——特別是犯罪和不得體的舉止(Wouters, 1999a and 1999b)。因此，整個舉止的機制變得更加具有強制意味。然而，儘管非正式行為的地位經過認可，而且也逐漸被整合進標準、主流的舉止符碼與人權當中，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於一九六〇年代以及一九七〇年代非正式成為社交上可接受的行為，並依然維持其原有的地位。

玖、螺旋狀過程中的社會與心靈變遷

一個推動正在進行之功能的分化、權力平衡的轉移，以及更大的相互依賴等的主要驅力過去是(現在也是)，為追求更大自由與獨立所付出之相互競爭的努力。在此持續進行的過程中，權力平衡的轉移偶爾會提供集體權力機會給相對來說邊緣的團體，而這些機會是依照社會排序來實現和表達，但通常會出現一些延誤。這個實現集體權力機會的過程，有心理的以及社會的面向。個人必須意識到這些機會，並且擺脫舊有權力平衡所要求的服從性(submissiveness)。這個過程並不像表面聽起來那樣容易，因為這種服從性經常是相當深植於個性當中。引發一種對於攀升的恐懼(參見第三章第五節)。為了讓他們隱藏

的權力彰顯出來，相關的個人必須組織起來，並且集體要求那些過去一直拒絕給他們，但是這種被拒絕的情況維持不了多久的機會⁴。

這個隱藏的權力被轉化為明顯權力的過程中，有一部分包括強調以及「發現」邊緣團體具有越來越多相互衝突的利益。在一九六〇年代，而且更甚於以往的現象是：社會整合累積成全國性的整合，而這也導致發現具有全國性規模的衝突，及其衝突所帶來的利益。儘管先前有一些舉國一致能接受的共同利益，但是在這個解放與反抗的階段，這些利益中有許多因為片面地偏袒既得勢力團體一方而遭到排斥。而以這些被排斥的全國共同利益之定義為基礎的舉止與理想，也就被解釋為一方面是以壓迫為基礎，另一方面是以「奴隸的心態」(slave mentality)為基礎。在許多協商中，過去既得勢力向來能夠成功地訴諸這種一般性的利益來做為國家福利與民族團結，如今卻遭遇到反抗。

在全國性規模的協商中，受到崛起的新興團體持續對商業與工業世界中之既得勢力施加向上的壓力，後者的權力範圍因而受到限制，而政府的權力範圍卻擴大。在既得勢力團體以及崛起中的邊緣團體間不對等的權力平衡關係越來越縮小，這也讓政府有更大的運作空間，可以用來顛覆這種平衡關係。此外，由於大眾主要聚焦在各種相衝突的利益上，許多的不公正顯現出來，民眾也就期待政府能「想辦法做點什麼」。在一九六〇以及一九七〇年代，這些條件創造出一股正面的「政府風氣」(government climate)。

⁴ 伊里亞斯在《宮廷社會》一書中解釋法國革命時，提到權力關係與階級的分歧越來越大，亦即不同社會幹部之間實際上的權力分配，以及扎根於舊有體制僵化的體制框架上之權力分配，此二者之間的差異。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Since 1998 良知 品味 責任
將學術當成一生的志業

性別·社會叢書 TCS18-04

非正式化：舉止與情緒的探究

版權聲明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Cas Wouters, 2007.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Sage Publicati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財產權人：國家教育研究院

(地址：23703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 2 號；網址：<http://www.naer.edu.tw>)

主譯：國家教育研究院

展售處：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電話：(02)2518-0207 (代表號)

台中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台中市區中山路 6 號

電話：(04)2226-0330 傳真：(04)2225-8234

出版者：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Cas Wouters

譯者：張可婷

發行人：陳坤森

責任編輯：黃雨婕、葉宗顯

營業事業登記證字號：13118544

住址：台北縣永和市永和路二段 285 號 6 樓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

電話：(02)22324332

傳真：(02)29242812

初版一刷：2011 年 9 月

ISBN：978-986-6338-37-3

定價：4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財產權人：國家教育研究院。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
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Tel: 02-3322-5558)
GPN：1010002156